

凡辛勤播種的，必歡呼收割

黃俊傑

《耕耘歲月——沈宗瀚先生自傳及其他》這部書的出版距沈先生謝世已經十二年。這十二年來，不僅台灣的農業、農村與農民出現了重大的變遷，而且整個台灣的政治與社會情勢也經歷了空前未有的大變局。在這一段歷史性的變局之中，我對沈先生的懷念未曾稍減。沈先生畢生關懷農民堅守農業陣營的情操，一直對我發出最親切的呼喚。沈先生晚年對我的愛護，以及所表現的種種超越年齡與省籍的情誼，在近年來台灣政治脈絡中，省籍鴻溝在少數人的挑撥下日益加深的變局裡，使我更覺得彌足

珍貴，倍加珍惜。

這部書出版的因緣必須從兩年前的一段往事說起。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大陸的中國農學會為紀念沈宗瀚先生逝世十週年，決定在十二月十七日舉辦〈沈宗瀚先生農業學術研討會〉，邀請沈先生的家屬、同事，以及大陸與台灣的農學史學者與會。十二月十三日，我陪同沈伯母、沈君山教授以及沈先生家屬，搭乘中國民航班機抵達北京。在飛機快到降落首都機場的時候，我忽然想起：出身台灣南部農村的我，第一次去中國大陸，是為了參加紀念沈先生的學術研討會。沈先生離開人世已經十年，但他似乎在冥冥中，牽引著我去訪問大陸的農業與農民。忽然間，我愀然憬悟：沈先生的精神並沒有離開人間，他雖歿猶存，他仍一如在世時一樣地關懷中國苦難的農民。

走出機場，首先迎上來的是宗瀚先生的女兒沈慈恩，她和沈伯母相擁而泣，四十年的分離與親情，都在剎那間化為淚水，一湧而出。我在旁目睹這一幕，為之感動落淚，四十多年的歷史變局，「人間正道是滄桑」，實在令人不勝唏噓。

在十二月十七日的研討會，以及十二月十九日參觀北京郊外房山縣竇店農村的過程裡，沈宗瀚先生的身影時時出現在我的心中。我想起一九七八年五月，我當時所編

撰的《沈宗瀚先生年譜》已經接近完成初稿的時候，經過台大同事劉清榕教授的介紹，第一次與沈先生見面。沈先生待人的誠懇謙和，解除了我未見面前的拘束感。他以相當濃重的浙江餘姚口音，談他一生在大陸以及台灣從事農業工作的往事。有時我聽不懂他的餘姚口音，還必須借助筆談，才能溝通雙方的意思。自此以後一直到他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五日逝世前這幾年的時間，我常有機會向他請益，在美國時也常收到他的來信。

在近代農業史上，沈先生的歷史地位是肯定的。沈先生早年克難苦學，從餘姚沈灣村一個貧窮的農家子弟力爭上游，歷經人間種種最艱困的苦難，終不為環境所擊倒，留學美國康乃爾大學，完成博士學位。沈先生這一段克苦自立的歷程是這一個苦難的時代最真實的見證，也是青年奮發向上的楷模。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沈先生學成歸國，任教南京金陵大學，開始種人的工作，為國家作育農業科學人才。抗戰軍興，沈先生出面領導中央農業實驗所，研究作物品種改良，調查全國農產狀況，不僅對抗戰期間軍需民糧的供應貢獻至鉅，而且也培養了許多第一流的農業人才。民國三十八（一九四九）年沈先生隨著農復會來到臺灣，參與建設台灣農村的工作，晚年

並繼蔣夢麟（一八八六一一九六四）先生出面領導農復會，展開各項工作，對近三十年來的臺灣農業有具體的影響。光復以來臺灣農業發展都直接或間接與農復會的設計及其工作有關。關於沈先生畢生服務國家獻身農業的歷程，我在《沈宗瀚先生年譜》（臺北：巨流出版公司，一九九一年增訂再版）一書之中已有較詳細的敘述，並將沈先生的公務生活歷程置於近代中國史的脈絡中來討論。

但是，我們閱讀沈先生有關農業發展的著作或流覽沈先生年譜，總會對一個問題感到好奇：這樣一位近代中國史上的農學大師求學經過如何？他經歷過怎樣的心路歷程？這部《耕耘歲月》的編輯意旨就是希望透過沈先生的自述文字使讀者對這一位農學大師的心路歷程和他的感情生活有比較親切的瞭解。《沈宗瀚先生年譜》的重點是採取歷史的立場來敘述沈先生為公務的歷程；而這部《耕耘歲月》則是側重沈先生一生私人感性的生活，希望能夠彰顯沈先生從貧困的農家子弟力爭上游，以至主持全國農業建設大業的心路歷程。一九八〇歲末，沈先生遽歸道山，張岳軍先生手書誄辭，中有「鍥而不捨」四字，最能實顯沈先生畢生奮鬥的實質意義。

在整理沈先生的檔案以及編輯本書的過程中，我進一步體認了沈先生私人感情生

活中最真摯的一面。收集在本書中沈先生追念喪逝親友及教誨子女的文字都是至情至性的文章。從這些真性情所流露的文字中，呈現出一幅伉儷情篤、家庭和樂的景象。在抗戰軍興、萬方艱難的歲月裡，沈先生兩喪賢偶，國難加上家難，哀痛逾恆。這種誠摯的夫婦之情流露於字裡行間，讀之令人泫然欲泣。民國三十（一九四一）年十月五日沈夫人驪英女士逝世於中央農業實驗所的實驗室，這個打擊使沈先生身心交萃。在同年十月七日所撰的〈哭驪英賢儷〉文中，我們看到沈先生與驪英女士之間那種事業上的學侶以及家庭裡伉儷情深的生活。先生繼室陳品芝女士不幸於民國三十三（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四日逝世，這次婚姻為時僅年餘，然品芝女士給先生的深情厚愛使先生未嘗或忘，沈先生在民國六十五（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曾追思品芝女士云：

品芝妹，自你卅三年一月十四日逝世，迄今六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已三十二年餘矣，未嘗一日不念你的深情厚愛。……你誠知我最深愛我最切，而我們結褵好像曇花一現；「貽你莫大痛苦」誠夫妻知己之言，今已三十三年餘，誠「貽你莫大痛苦」，惟苦中有甜「最有價值」，好似曇花栽培年只開三四小時而謝，仍有栽培欣賞的價

值，我倆恩愛夫妻一年遠勝於貌合神離的夫妻白首。

我誦讀先生這一段日記，爲先生的至情至性感動無已。正因爲這種至情至性隨時流露，所以先生的家庭生活是一片祥和，洋溢著溫情與歡樂。民國五十一（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沈夫人廷芳女士生日，先生寫「妻的生日」短文一篇，記述與兒女們一起外出買衣料，二嬌女前行，先生與君山後行的情景：

她們拉手而行，我們亦拉手隨行，店員旁觀而笑，媿媿低頭小聲說：「爹爹在外裝得比較老成一點，哥哥還是這樣頑皮。」自然我們還是戲笑不已。（見：〈妻的生日〉）

這樣一位「在外裝得比較老成一點」的慈父，在家裡的生活如何呢？我們且看看女兒筆下的父親形像：

平時爸總因公事太忙，即使回到家與我們聊天時，腦子裡還是轉著公事，可是又願意與我們談，因此常沒頭沒尾的打岔幾句，便總被我和妹妹取笑，次數多了，就抱怨他在家裡是「弱小民族」被我們聯合「虐待」。雖然爸爸自視爲「弱小民族」，但是對我和妹妹這兩個「列強」還是愛護得無微不至，有時我們做錯事，被媽媽罵了一頓後就賭氣不吃飯。爸爸總是最好心的藏了根香蕉，輕手輕腳的走到房間來……。

（見：沈慈源，〈慈父〉）

任何一位讀者流覽這些文字，都能體會得出：這種在家庭生活中所蘊蓄出來的精神力，量正是沈先生一生奉獻農業為國服務的內在源泉。

除了來自家庭感情生活的精神力量之外，通貫沈先生的一生尚有一股重要的精神力量，那就是他虔誠的宗教信仰。自十七歲起，沈先生即常從大哥處聆聽基督的道理。二十三歲時在北平獲識徐寶謙先生，開始參加查經班。二十六歲正式受洗，六十年來工作勤奮，信道益堅，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正如他的子女所形容的，沈先生是一個勤勞苦心的中國老農，專心一意耕種自己的田地，因為有堅定的信心望見豐收的遠景，所以持定手中的犁頭，在風雨中立定腳根，吃苦負重亦不嗟嘆（參考：沈慈輝，〈給在天國的父親〉，中央日報，民國七十年四月二十八日副刊）。沈先生曾自撰座右銘曰：「學道信道樂道，識人用人容人」，通觀沈先生的一生，他的確實踐了這兩條自我期許的信念。正因為在私人生活中信道誠篤，沈先生在公務生活中才能真誠地識人用人容人，這兩者原是合而為一的。

正因為沈先生待人處處流露真性情，所以他對學生的教導無不使學生真心感動。

這種真性情是沈先生一生識人用人的根本基礎。例如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五月三十日沈先生視察貴州農業，當天與學生蔣彥士長談至深夜，勸蔣彥士結婚並赴美研究作物育種學。蔣謂：「戰事如此，你們站在崗位拚命，我獨去美讀書享福，於心何安，待勝利後去美較好。」沈先生說：「我現最憂慮者為後起無人。戰時中國與外國隔絕，我們孤陋寡聞，學術容易落伍，將來不能領導農業技術。所以現在要你這種不肯取巧享福的人去美研究，得新知識，學成歸國，可以領導新農業。」師生兩人深談，老師勸學生到深夜二點（見：《中年自述》頁四八）從沈先生的自述中，我們看到了他認人用人中最動人的一幕。而這種動人的真情感隨時流露於沈先生所寫追念師恩、懷念益友各篇文字之中，這些文字部份已收錄於本書之中。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覺得沈先生在農業史上的地位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觀察：

第一，沈先生的農業思想及其畢生功業代表近代中國農業改良運動史上「農業派」知識分子的主要取向：在近代中國的大變局中，農業的現代化是一個極其重要而影響深遠的問題，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至為分歧，但比較有影響的則有二大陣營。第一派學者看農業問題較傾向於人文學者的立場，把農業建設置於文化

發展的廣泛視野中來考慮。我們可稱採取這種觀點的近代知識份子爲「平教派」。這派人士認爲中國農村問題基本上是鄉村農民教育的問題，所以農業現代化應從農民教育入手。晏陽初（一八九三——）先生的看法最是爲其代表。一九三〇年七月，晏先生指出，農村問題雖然千頭萬緒，但可節結爲愚、貧、弱、私四個字，而根本解決這四個問題的辦法就是進行四種鄉村教育：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公民教育（見：晏陽初，〈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定縣工作大概〉，收入：章元善等編，鄉村建設實驗，第一集，上海，中華書局，一九三四年，頁五六——五七）一九三〇年代及一九四〇年代，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在河北定縣可從事的鄉村建設運動就是基於上述看法而來的。晏先生的看法與梁漱溟（一八九三——）先生不謀而合，皆認爲鄉村建設即是民衆教育或社會教育。第二派人士則取農業專家的角度，側重技術創新的立場來談農業發展，我們不妨稱之爲「農業派」。「農業派」知識份子多爲留美農學生，他們一般認爲中國農業及農村問題乃是農業生產力之問題，而欲提高生產力以養活龐大人口則必需自改良作物品種、提高農業技術水準入手。這種意見一方面上承清末農學改良思潮，與孫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先生，梁啓超（一八七三——一九



二九)、羅振玉(一八八六——一九四〇)等人的農業思想相呼應；一方面則與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農學改良運動相呼應。而沈先生正是「農學派」知識份子中具有代表性的歷史人物。早在民國十七年五月，沈先生就作物育種改良為農業改良之前提的看法(見：氏著〈我國作物種子改良及推廣方式芻議〉，金陵大學農林科農林叢刊第四十五號，頁一)。民國十八(一九二九)年三月五日，國民政府任命沈先生為陝西省政府農礦廳廳長，先生堅辭。同年九月，沈先生亦堅辭金陵大學農學院院長職，就是基於以下的認識：

改進中國農業的程序，首先應該增加農業生產，而增加生產以改良品種入手為最易。(見：《中年自述》，頁二十五)

沈先生對中國農業現代化的看法正是「農業派」知識份子的代表。這種農業思想具體地落實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一年金陵大學與美國康乃爾大學合作的「中國作物育種改良計劃」；更落實在一九四八年以後中美兩國政府合作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三十年來的農業建設計劃之中。在近五十年來中國農業發展史上，沈宗瀚先生所踏下的腳印是紮實而深刻的。

第二，沈先生少年時代就主張經由國際合作以改 中國農業，這項主張在近數十年來落實而成爲近代農業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模式：一九二〇年，上海《密勒報》(Miller's Review of the Far East)以〈美國如何善助中國〉(“How Can America Best Help China.”)爲題舉辦全國性英文作文比賽，沈先生時年二十六歲，求學於北京農業專門學校，在是項比賽中脫穎而出，獲得首獎。在這篇文字中，這位當時二十六歲的青年提出了中國與美國合作共同改善中國在各方面處境的理想。這篇文字的寫作能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是針對當時巴黎會議對山東問題的解決方式以及日本侵華的野心而發言，但是，這篇文字中所揭櫫的理想經過沈先生畢生鍥而不捨地努力，已經具體地落實於他後來所寫的「中國作物育種改良計畫」，一九四六年的「中美農業技術合作團」一九四八年成立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以及一九七一年五月廿二日成立於臺南善化的「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等國際合作的農業機構之中。

沈先生對國際合作這項理想的執著畢生不渝，從他任教金大，倡導金大與康大合作開始，直到中年參與農復會工作，晚年爲「亞蔬中心」的成立而奔波，畢生的奮鬥皆抱持這項理想，真正體現了「鍥而不捨」的精神。而更具有歷史意義的是，經過沈

先生鏗而不捨的努力，他終於把國際合作的理想轉化為事實，為中國農業改良運動史寫下了光明的一章。

在沈先生辭世十二年之後的今天，閱讀《耕耘歲月》這部書，沈先生的形影與言談，又一一浮現在我的眼前，一切恍如昨日。在我與沈君山先生編輯這部書的這段期間，外面街道上立法委員候選人的宣傳車正往來穿梭，各自以高亢的語調訴說著形同水火的政治主張，使近年來日益突顯的省籍、階級以及族群關係更趨緊張。在這樣的政治氣氛裡，緬懷沈先生生前與我之間的一段情誼，使我對沈先生的寬容大度與和煦的風範，更加景仰與懷念，沈先生和我對於農業農村與農民有著共同的關懷。正由於站在這種對農民的關懷的基礎上，我們之間可以超越年齡的差距以及省籍的鴻溝，而建立最率直的情誼。這是人性中最善良，最值得珍惜的一面。這個面向，在日趨極端的台灣社會中，似乎已經逐漸成爲一種奢望了，思之令人喟嘆！這部書的出版，不僅爲了紀念這一段使我珍惜不已的感情，更是爲了呈現近代農業史上的典型與風範。我深信，沈先生以畢生的生命在中國大陸和台灣農田上辛勤的播種，將來必有歡呼收割的一日！

（寫於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沈先生逝世十二週年紀念日）